

刘琅 桂苓 / 编
GANDONG BAINIAN

感动 百年

20 世纪的记忆

百年

思想卷

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分，这代人曾经幼稚地相信，神圣的社会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那些生活本来应该属于她们的少女们的生命，早已为此而埋葬在无数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一座座坟茔中，更为悲惨的是，从这些无可挽回的荒坟中发出的怯生生的呼唤已不能激发人们停下来悲哀地沉思，历史竟然要求我们忘却。似乎，历史的要求无论多么蛮横无理，也是客观必然，是人就得屈从于它的绝对权威脚下。

二十世纪的记忆丛书

感动百年

二十世纪的记忆丛书

感动 百年

GANDONG BAINIAN

下
思想
卷

刘琅
桂苓
编

二思想卷

感动百年

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

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二十年前他们有過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大陆思想史。我曾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他门类，就是为了寻踪他们而来。

1968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些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才小学毕业，只能守候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想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1972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

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今天想来,当时是以旺盛的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而且还属于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既觉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怀念。我开始熟悉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学讲堂,竟是在那种时候,肯定有浅陋误读之处。然而事后回忆虽然有点可笑,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错了。

从“民间思想村落”出来后,我始终摆脱不了当时那些业余状态下的精神记忆。这些记忆成为某种剩余意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学院生活对我而言,就好像进入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时时作祟,既是烦恼,却也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我相信,在当年那种业余状态下的思想生活里有必须淘洗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不必抛弃。知识与思想的传统是必须尊重的,轻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经历的“六八年人”“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转眼即逝,也不该美化。但是有一教育史的发展趋势却可注意,也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国度;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

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稍有性情者,无论是在哪所院校,都会感到是生活在“三间大学”,“一地鸡毛”。每年的这种时候,我会更加怀念当年散播在乡野小城的那些“民间思想村落”。身陷大学环境,理应充分尊重知识传承,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健康的发展。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老三届写稿,出版《苦难与风流》一书。我把自己那篇回忆老三届的文章写成了一篇“寻人启示”。

我始终在寻找他们,该不会烟飞灰灭?我读《枫》,枫说他们已去;我读《伤痕》,伤痕里没有他们的印迹;我读《蹉跎岁月》,那里只有漂浮的枝叶。我还是贴一张“寻人启示”吧,或许他们中会有人路过,能够辨认出自己昔日的足迹?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1968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书!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1975年以前,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1977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

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挡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

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你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

在思考的问题。即使在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你们选择的课题也应与早年的问题相距不远。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问题,更遗忘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

“寻人启示”寄托了我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寻找那些游弋于体制内外尚未除尽的“余数”,却苦寻不遇的心结。他们理应还活着,之所以隐匿不见,是不是也因为功名利禄的腐蚀才失踪了呢?“民间思想村落”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这是天大的幸运。但是,一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就直奔学术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如果真是这样,灵魂被“除”尽,一点“余数”都未留下,我敢说,那就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没有一个人来揭下这份“寻人启示”。不过,我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作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给大学生记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

欠债感一直延伸到1993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我打破那类出版物序言的写作惯例,写完向导师致谢的一节后,又另辟一节交代论文的最早“灵感”来源,是在进入学院生活以前那段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的思想经历——十几年前“六八年人”对我的那场思想启蒙: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1949年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

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1968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法国人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1968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的思想命运。就我而言,1968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历史实在残酷。“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牺牲了,或者说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然而也可能因为这一点,我的思考显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续“六八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对法国革命的穿凿附会;既要尽可能客观清理从启蒙到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思潮源流,又要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到中国留下足够的发展脉络;既要坚持法国大革命中高昂的价值理性,又要批判这一价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负面灾祸。这三层拖累,尤其是最后一层拖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六八年人”来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价。在本书写作最痛苦、最动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历史无情,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网有疏,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先知觉后知,是谓启蒙;后知续先知,勉为继承。谨以我绵薄之作,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之灵;同时,亦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

我的论文答辩主持人在看到这一序言后,约我面谈了一次。那次谈话开始时,我还有点忐忑不安。不料老人开口竟说,我关于“六八年”人的记述打动了,使他知道了当初在牛棚里尚无法知道的情况。听完老人的那一席话,我极感意外,同时也自觉惭愧。我们自

己敝帚不珍,就在上一代人好不容易开始理解我们当年的思想经历时,“六八年人”自己却正在走向消失。珍惜这一经历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少下去,理解这一经历的老一辈学者却可能一个一个多起来。这不也是思想史,而且是以现在进行时态在当下发生着的活生生的思想史?

就在我几乎对自己这一代人失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故事。1994年春节,上海发起邀请全国灯谜大赛,电视台录像向全市转播。荧屏一闪,突然出现了一个我打听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赶紧去比赛地点找人,一问,却是刚走一天。几天后,我把这场寻友不遇的感受,写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版上:

自从离开了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昏暗的铁路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唯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我自以为我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离我而去。我只能放弃希望,放弃寻找。

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未必能揭示当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而确实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的“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面对这幅图画,我只能背过脸去。

我曾想挣扎,最后为自己这一代辩护一次。但是,底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被内心另一种声音压了下去:

思想史上以1968年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

大无比的废纸篓。大多数人进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职员状态,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由于具备底层的生活经验,洞悉明察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细胞的各种缝隙,内心深处又解除了当年那种虚假道德束缚,“六八年人”将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种结构的缝隙,从中渔利。新一代社会中坚也许就会这样形成。

新一代社会中坚是灰色的,这是因为“六八年人”的内心世界有过一场灰质化裂变。那场裂变不知道是哪一天发生,但是却可以看见那股世故而又狡猾的灰色一天天从里向外泛出来。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而是转化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我们的内心已经结痂成茧,外伤变为内伤,很不透明,甚至难以射进阳光。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历史大限,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大限,就停留在这里。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已经死亡。

赋予我们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给予最善意的估价,只有十七年的积累,太疲乏,太浅薄。尽管我们当时读了一点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能起作用的毕竟有限。更何况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与十七年政治文化在某一方面是同属一脉,后者是前者的遥远后裔。由此,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内在原因,还在于当年我们吞下的精神面包既有营养也有毒素,我们只坚持其营养的一面,拒绝反当其有害的一面。

对这一代精神生命的否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向下突破,返归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这一代人中已经不少人这样做了。还有一种是向上突破,脱胎换骨,更换精神血型,走出另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到目前为止,我只在一个人的作品里看到有后一种希望,那就是张承志。他欲以笔为旗,只身面对当今虚无主义思潮的十面埋伏。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时也担心他拒绝淘洗昔日的精神资源,恐难有效拒抗虚无主义?如果笔管里流动的是“六八年人”的旧式理想,那么下一代自然会问,这样以笔为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敬重他的孤胆英雄气,以目相送,看他在荒芜英雄路上逐渐

远去。

正在消逝的1968年思想群落,后来据我了解,当年在北京有过更为自觉的思考。在内地其他省会级城市,也有过零零散散的村落。于此相应,1968年的大陆,还出现过一些半地下的文学群落,如以食指为代表以北岛、芒克等人为主将的白洋淀村落。他们都是这一代精神生命的“根”,至少是“根”之一,比来自西方的“符号根”更有泥土气息。文学群落比思想群落幸运,从白洋淀村落到朦胧诗,从朦胧诗到崛起的诗群,再到今日之先锋作家,这条线索始终未断,而且顽强发展,结成了正果。这些年来,一部分文学史家正在紧紧追踪这一线索,一些冠以“‘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出版物正在公开发行;大学课堂已经开始讲授有关这一现象的文学史篇章;不定哪一年,不定哪个文学博士会以此课题很严肃地拿到一个很滑稽的博士学位,那时食指和他的伙伴们肯定还活着,读到这一新闻,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相形之下,1968年民间思想界的“食指群”,则令人感慨。也许“思想食指”比“文学食指”所需要的外界环境更为宽松?也许是“思想食指”必须先指向自己,对其内部的精神淘洗要求特别苛刻?总之,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许是所有的环节都出了问题,一群“思想食指”刚刚拱出大地,一阵暴风雨袭来,很快就夭折了。他们没有结成正果,至今还处在失踪状态……

我含恨怀念我们的“食指群”。恨意难消,却还是想追赠他们一个集体知识分子的职称。不管当年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也不管现在是局长,还是股票炒手,那种业余状态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举制下现在那些功名在身吞吞吐吐的青年教授,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只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如其他类型其他辈分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教授生命上,也是短命的一代。大多数人未老先衰,提前进入暮年状态。就外部环境之恶劣,人们应该原谅,说一声:“可惜”;就内心状态之残破,后人再厚道,至少也能说一声:“可悲”。有人说,历史的苦难总是能换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底气说这句话。更多的可能是,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堕落,进入了一种

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罗曼·罗兰说，三十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不看今朝！

与历史学的其他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散播在民间村落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曾壮过多少人读史之后的胆气？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记录！

不是别人，正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哥德诗云：“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是的，这是我的烦恼。

小概率事件

朱学勤

小概率事件就是意外，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换算成文人“话语”，就要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小至街头邂逅，大至晴天霹雳。

我今天的恶业，就开始于一个意外。1982年春天，我最后一次考研究生，不幸在车厢里遇到一个窃贼。那时他已经得手，将我上衣口袋里的一个信封扒窃过去，而我丝毫没有知觉。他打开信封一看，却无分文，仅一张准考证而已。他也可以悄然下车，将那张薄纸一揉一扔。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冒着被我喊一声“捉贼”的风险，将信封掷还给我，还不失幽默地提醒一句：“老哥，看看丢啥不丢？”这一奇遇造成我生活的转折，一直延伸到现在。以后也不断遇窃，有一次甚至偷到住室里，但再也没有碰上一次这样的古风义贼。我爱读龚自珍，此后读到“左无才相，右无才史，抑巷无才偷，藪泽无才盗”，就有共鸣，只是觉得老先生亢奋，还有点少见多怪。

那时还剩有最后一点野气，习惯于爬货车旅游。有一次带着夫人和我弟弟爬一列货车去西安，一路奇遇不断，甚至碰上地震。最为奇怪的场面，是在豫陕交界的一个鸡毛小站，火车突然停下不走了，说是前面出了事故。好几列火车就在我们身边快快停下，其中还有直达快车“74次”。那一趟车从上海出来。开到当地算是天之骄子，通常对这样的鸡蛋毛小站是不屑一顾，呼啸而过。这一次它算是屈尊光顾，但是所有的门窗紧闭，唯有车厢内灯火通明，傲对穷山沟的苍凉幕色。看看天色将晚，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我们只能跳下货车，就沿着这一溜灯光的下面走，想碰碰运气。走啊走，快走完了，运气也终于来了，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窗内大声叫喊我弟弟的名字，

一边喊,一边打开车窗,把我们一个个接了上去。原来是我弟弟小时候的同学,但早已不同校,很早就转学到了另一个学校。那一次他是从上海到西安去探望父母,往车下张望一眼,竟然就看到了一分别多年的小学二年级同学在陌生山沟里转悠。那男孩张嘴就喊,冒叫一声,居然就没有半点搞错。多么可爱的童言无忌。

在一段时期内,人的运气不能太好。否则,另一种概率就会在负极聚集,生成一些负面事件,一报还一报。那次美国之行,我不止一次碰到好运,结果乐极生悲,留下了一个终身遗憾。

我小时候常常等在弄堂口,等着那个小伙伴,回来讲他中学里有个叫刘海生的语文教师,如何剑胆琴心,思想深刻,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一两个细节或者小故事。那又是一个精神饥渴的季节,随便一颗种籽落在少年人干涸心田里,都会发酵疯长。久而久之,在我的热切想象中,刘海生就被放大为一个“会弹钢琴的十二月党人”。而我成年后反省,发现自己有一面是旁听着刘海生故事长大的,居然从未谋面。1996年冬一个夜晚,我在上海外滩55路公共汽车里旁听到一段对话,一个乘客对另一个乘客说,她的中学老师责怪她不能将《顾准文集》这样的书只看一遍。当时车厢里没有灯,黑暗中鬼使神差,我竟然不去插话,而且一语猜中,那个中学教师就是我想念了二十多年的刘海生。这个小概率事件使我兴奋不已,回来写了一篇短文《缆绳系岸》,发在《新民晚报》上,大意是说生活里有一种像缆绳一样的东西,多年前飘过来,再打个结飘送过去,按概率它走不了那么远,早就应该寸断,居然就磨不断,一寸一地蜿蜒,几十年内走了一个来回。刘海生当时已经是沉痾不起,在病床上读到这篇文章,打电话来问,这样就有了联系。他很希望我能去谈一谈,大概想看看一个素昧平生的旁听生是个什么模样。我那时出国行期在即有些忙乱,更顾忌去他病床边看望的人已经太多,不好意思添乱,于是双方在电话里长谈了一个多小时,约定我从美国归来,再好好地见一面。我到了美国,去了南方,在佐治亚州一个偏僻农舍里,与写作《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的林达夫妇畅谈了三天。说起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他们居然是刘海生的正宗学生,至今还保持着很密

切的联系,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于是那三天就多了一个话题,不断讲刘海生的故事,他的险峻出身,他的“文革”遭遇与不屈,还分析刘海生这样的理想型人格在大陆这个环境为何罕见,以及他如果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一定浮想联翩,等等。三个人把一个世界越说越小,似乎这世界上的知音不必灰心,或迟或早,上帝总会安排机会,让他们碰到一起。其实是因为太少,就这么几个人,很容易相互知道。反过来一看,也是因为少,动如参商,更可能缘吝一面,终生遗憾。几个月后,我回到上海,行囊未解,就接到一封镶着黑边的小信封。打开一看,刘海生因病去世的讣告赫然在目。

我颓然无语,只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这已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生不得见死方见。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会有这么多人来与他告别。人群沉默着,排着队,一直站到大厅外面。吊唁者中,我还认出几个经常见面的熟人,此前却谁也没有想起来说一声,我们原来有一个共同的师友,有一个本来可以相通的枢纽!按照他的生前爱好,那天没有放通常的哀乐,而是播放他喜欢的一首钢琴曲——肖邦《葬礼曲》。财经大学的刘新是我的同代人,此时代表海内外所有同学致悼词,那已经有好几代人了。刘新最后一句泣不成声,向刘海生遗像深鞠一躬:“老师,下课了。”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海生夫人赵佩秋先生,她拉着我的手,泪下如雨:“缆绳断了,缆绳断了……”我知道是我不好,竟然是在老师最后一次“下课”,才得见先生一面。到临了,我还是一个不肖弟子,一个不入册的旁听生!

我到现在也拿不准这些小概率事件的意义。人们通常埋首于日常生活的川流不息,不太欢迎小概率事件突然来袭。是让人在琐事中逐渐平静,以免一惊一乍,还是来一点冲击甚至突然一击,身心一震?当然也不能高估小概率的作用。即使一箭袭来,只是转瞬即逝,确实也难撕开那么厚重的尘埃。但它们毕竟有过一二,也就证明这生活恐怕是会有一些意外。

这世界还有意外。那也就值得等待。

民间思想的坚守

钱理群

两年前,读到朱学勤先生发表在《读书》上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时,我和作者一样“怦然心动”,并且“潸然泪下”:我们同时想起了当年的那间“小屋”。——尽管此时我在北京,他仍居山中,彼此已相距千里万里……

这精神兄弟间的心灵感应,正形成于那样的时代,非亲历者不会有,也难以理解;而竟能如此完整地保留至今,这又是让我们感到自慰,因此而格外珍惜的。

朱先生在文章中所提到的“民间思想村落”,我想,在本世纪的中国,大概出现过两次,而具体背景、情境、命运却大不相同。第一次出现在五四前后,现在已经进入正史:毛泽东等的“新民学会”,周恩来等的“觉悟社”,恽代英等的“互助社”……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民间思想村落”,他们处身于那么一个时代大转变、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先是在民间进行自由的阅读与思考,然后生逢其时地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社会革命中,把他们的思考转化为思想文化,以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变革实践,而最终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及他们自身的地位。而在随之建立起来的高度统一与集中的国家体制内,也有过重建“民间思想村落”的努力——例如1956年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江苏的“探索者”等等,但都被“反右”风暴扫荡以尽。再经过历次运动,民间思考甚至于停止了。——少数人体制外的思考自然是存在的,但在我们这里却只有个别的“点”,而形不成连续的历史线索,这与几乎处于同一状态下的苏联大不相同:应该正视这一事实,并加以反省。在我看来,真正的民间思考的恢复,以及再建“民间思想村落”的努力,是在“文革”的

后期,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再也不能不面对现实了,当理想的面纱脱落,露出狰狞面目时,怀疑开始并且逐日增长了。于是,体制之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就由少数先驱者发展到相当的范围:不仅是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顾准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有一定知识的工人、农民,甚至还包括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党的各级干部,以及邓小平、张闻天这样的高级领导人物——现在已经传为历史佳话的邓小平在江西田间小道上的思考,当时也属于民间思考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几乎是全民性的民间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为以后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的思想解放运动,以至整个中国的改革运动,做了思想的准备,以至骨干力量的集结与训练准备的。要真正认识与理解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其实是应该溯源到这一时期的民间思考的。

我想,也许只有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比较清晰地看出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自发建立起来的或大或小,或显或隐,或严密或松散的“民间思想村落”的特点(包括局限)与意义。尽管无法获得具体的统计数字,但这样的“村落”散布得很广,却是可以肯定的。篮子在书的第一部分“流逝的音符”中的回忆,就足以说明,文化革命的风暴确实已经深入到中国内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使最不易变动的、中国社会的基础也发生了动荡,建立了各色名目的“群众组织”,展开了可谓生死的搏斗,历来与历史无缘的“圈外人”,例如作者写到的那位剪刀社的“一丁”,现在也卷入了历史的漩涡,连篮子自己,这样一个本已生活在下层社会的未成年的孩子,也被由居住在遥远的北京的“领袖”所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驱赶,被迫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领教“公社书记的‘杀威棒’”,并因此由于生活本身的教育而加入到前述决定以后中国命运的民间思考的历史潮流之中。作者笔下的那个在自己的墓碑上赫然刻着“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几个大字的“默默无闻的生者与逝者”的故事,正是表明了,这一民间思考的历史潮流是怎样唤醒与震撼着中国社会底层的心灵世界的。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基础上,由思考者的聚合而导致“民间思想村落”的产生,就几乎是顺理